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张立媛, 刘成斌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在中国进入了计划实施阶段。尽管以往研究探讨了再就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但结论却争议不断。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情境,结合中国家庭经济行为与代际关系的特点,构建了以收入水平、向下代际经济支持、老化态度、社会价值为中介,以养老观念为调节的分析框架,旨在检验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使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倾向值匹配、KHB中介分解效应、调节效应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再就业能够显著降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促进其心理健康,通过倾向值匹配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中介机制表明:在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中,收入水平、向下代际经济支持、老化态度、社会价值分别能够解释其中的6.49%、3.79%、23.65%、32.41%,这意味着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对精神的需求要远大于经济需求。调节分析表明: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会削弱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以上结论,建议加大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政策的扶持力度,创造良好的用工环境,宣传积极的养老观念。

关键词:再就业;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代际经济支持;养老观念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22) 03-0056-15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22.00.015

收稿日期: 2021-11-17; 修订日期: 2022-02-25

作者简介: 张立媛,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刘成斌, 社会学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策略,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在中国进入了计划实施阶段。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退休年龄大部分适用于男性职工满60周岁,女性职工满50周岁,女干部满55周岁。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7.3岁^①,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老年人在退休后仍有相当长的生命历程。而老龄化同样会带来劳动力供给不足、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潜在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2]。因此,鼓励老年人重返劳动力市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倡议应运而生^[3-4],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容易引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3],因而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成为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战略目标,其中再就业被视为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5]。退休老年人再就业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究竟如何?在延迟退休政策的大背景下,研究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有利于探索老年人再就业的可行路径,对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再就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颇具争议,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三种观点,分别是健康促进假说、健康损害假说和无影响假说。

健康促进假说认为再就业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体而言,再就业可以维持老年人角色的持续性。退休可以视为一种角色的丧失,并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6],与仍在工作的同龄人相比,退休人员表现出了更多的心理困扰^[7-8]。而根据连续理论,退休人员会被激励去实现角色的连续性,以维持甚至提高自身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其中继续工作就是保持退休人员原有生活模式的方式之一^[5]。因此,与未就业的老年人相比,再就业能够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症状,促进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9-10]。

健康损害假说认为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老年人的福利。首先,再就业占用了老年人的闲暇时间,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11-12]。其次,与西方国家不同,受传统文化影响,我国老年人更倾向于安度晚年,再就业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不利影响^[13]。尽管继续工作的老年人会通过代际经济支持来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但却是以牺牲该群体的幸福为代价^[11]。最后,有研究指出,正常退休并不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继续工作反而会导致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14]。

无影响假说认为老年人再就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有限,继续工作并不能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健康福利。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超过传统预期退休年龄的继续就业与健康福利无关^[15]。另一方面,除了再就业外,非经济活动的社会参与也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16]。这就意味着,再就业并不是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唯一途径,不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其心理健康水平与再就业人群不一定存在着显著差异。

现有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借鉴,但是也存在着不足:①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存在明

① 数据来源于《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8/202006/ebfe31f24cc145b198dd730603ec4442.shtml

显差异，再就业对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争论有待进一步廓清。同时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再就业对老年人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心理健康方面的探讨，与西方相比，我国鲜有对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展开研究。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上，而忽略了“样本非随机选择问题”产生的偏差。③再就业对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生成机制和作用机理未明晰。基于此，本研究的目的是：①检验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何种影响？②通过倾向值匹配以缓解由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③分析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机制与分析框架

与西方国家大多数老年人再就业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不同，我国老年人再就业的目的一直都存在是“经济需求”还是“价值实现”的争议^[17]。同时我国以家庭养老为主，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是影响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重要因素^[11]。基于此，本文拟在关照中国现实的背景下，展现再就业影响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机理，提供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中国证据。

1. 经济行为的中介机制

一方面，从家庭经济学区域出发，基于利他主义和家庭成员偏好一致假设，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也会将其他家庭成员的诉求纳入其中^[18]。尤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中国家庭更加强亲代与子代的代际一致性，在分析家庭成员的经济行为时更应把家庭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单元^[19]。另一方面，受以家庭为中心主导下的责任伦理影响，父母通常会不计回报地付出，家庭资源的分配往往会向下倾斜^[20]。总之，大多数老年人会在身体尚可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甚至甘愿被“啃老”，为了子女会继续参与工作从而放松子女的预算约束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因此，老年人再就业不仅可以通过增加收入获取生活保障，还会通过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来缓解子女的预算约束^[11]，进而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正向影响^[21]，以减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

2. 精神作用的中介机制

再就业还可以通过非经济因素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老化态度是人们对自我衰老过程的一种评价认知，老年人会把这种认知嵌入对自我概念和身份认同的理解之中^[22]。在再就业与老化态度的关系中，一方面，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在保持社会活跃时，会延缓衰老的过程^[23]。作为保持社会活跃的重要方式之一，工作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24]。另一方面，老化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构建，经历的事件会影响人们对老化的认知^[25]。贝克（Beck）指出，职业是走向世界的关键，就连“老年”一词也是由“没有职业”来界定的。当人离开了工作，他就步入了老年，无论他自己是否服老^[26]。因此，再就业可以保持老年人较高的社会活跃度，促进积极的老化态度，而退休事件可能会引发老年人消极的老化态度^[27]。所以，再就业可能会提高退休老年人积极的老化态度水平。同时，在老化态度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中，研究发现积极的老化态度会削弱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进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28]。因此，本文认为老化态度是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

健康的中介变量。同时, 工作为人们提供了自我价值感, 失去工作不仅剥夺了价值功能, 还意味着技能损耗和社会地位的下降^[24]。因此, 再就业还可能通过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感进而影响心理健康。所以, 本文认为再就业会因为提高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积极老化态度和社会价值感而有利于其心理健康, 减少抑郁倾向。

3. 养老观念的调节机制

尽管已有研究分析了再就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但是在中国情境下忽略了养老观念的重要作用。与西方国家不同, 我国自古有养儿防老的观念, 直到现代依然相当普遍, 在这一观念的驱动下, 老年人往往倾向于子女养老。不同养老观念会影响着老年人对再就业这一行为的态度, 有研究发现, 持有养儿防老观念的退休老年人更倾向于将养老责任寄希望于子代, 而不愿意继续就业^[11]。而不支持养儿防老观念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依靠自我养老, 更愿意退休后继续工作。因此养儿防老观念会调节再就业与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再就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程度的大小会因养老观念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基于此, 本研究将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嵌入到中国国情之中, 以老年人经济收入、向下代际经济支持、老化态度、社会价值为中介变量, 以“养儿防老观念”为调节变量来构建分析框架, 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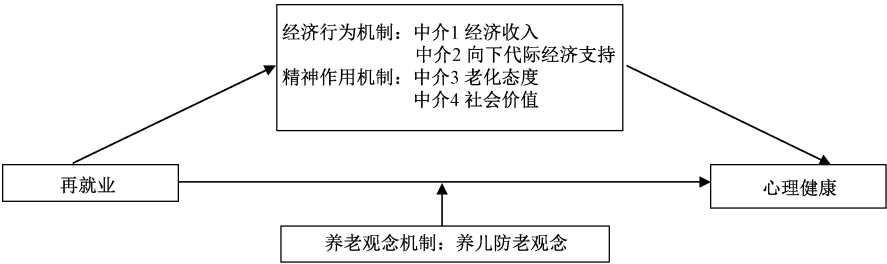


图 1 再就业影响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1. 数据来源

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中, 只有 2014 年涉及了老年人群的老化态度量表, 出于变量选择的需要, 本文采用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该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 使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对我国 29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进行了调查, 共获得 11511 个样本。考虑到我国的城乡差异以及退休政策主要针对城镇地区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仅选取城镇样本。与单纯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不同,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年满 60 周岁并享有离退休待遇的城镇地区的老年人群。鉴于户籍划分可能会遗漏进入城镇工作后被纳入城镇养老系统的农业户口的老年人群^[13], 为保留样本选择的完整性, 本研究中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包括少部分农业户籍并享有离退休待遇的群体。

2. 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为检验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Y = B_0 + B_1X + B_k \sum controls + \varepsilon \tag{1}$$

其中， Y 是因变量心理健康（抑郁倾向）， B_0 是常数项。 B_1 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 $\sum controls$ 代表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B_k 是控制变量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系数， ε 为随机误差项。

(2) PSM 倾向值匹配。以往研究发现，老年人再就业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以往的研究方法忽略了“样本非随机选择问题”，即样本本身的特征状况也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反事实框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倾向值匹配分析，以尽可能地减少混淆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Y = ZY^1 + (1 - Z)Y^0 \tag{2}$$

$$ATT = E(Y^1 - Y^0 \mid Z = 1) \tag{3}$$

其中，式（2）中， Z 为处理变量，当 $Z=1$ 时，观测到的个体在实验组，实际结果为 Y^1 。当 $Z=0$ 时，观测到的个体在对照组，实际结果为 Y^0 。在本研究中，再就业为实验组，非再就业为控制组。式（3）中 ATT 表示实验组的平均处理效用，即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净效应。

(3) KHB 中介分解效应。为了发掘不同中介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结果估计，以及比较经济行为机制和精神作用机制中介比例的大小，本文选用 KHB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分解^[29]。具体模型如下：

$$Y = \alpha_f + \beta_f X + \gamma_f Z + \delta_f C + \varepsilon \tag{4}$$

$$Y = \alpha_r + \beta_r X + \delta_r C + \varepsilon \tag{5}$$

$$R = Z - (a + bX) \tag{6}$$

其中，式（4）中， Y 是因变量心理健康（抑郁倾向）， α_f 为常数项， X 为关键自变量再就业， β_f 为再就业的系数， Z 为中介变量， γ_f 为中介变量的系数。 C 为控制变量， δ_f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ε 为残差项。式（5）是不包括中介变量的简约模型，其中， α_r ， β_r ， δ_r 分别表示常数项、再就业的系数与控制变量系数。式（6）的思想是从 Z 中提取 X 中不包含的信息。这是通过计算 Z 对 X 的线性回归的残差 R 来实现的，其中 a 和 b 是线性回归的估计回归参数。用 R 替换公式（4）的中介变量得到以下公式：

$$Y = \tilde{\alpha}_f + \tilde{\beta}_f X + \tilde{\gamma}_f R + \tilde{\delta}_f C + \varepsilon \tag{7}$$

进一步检验 β_r 和 $\tilde{\beta}_f$ 的差异是否显著，若差异显著则中介效应成立。

(4) 调节效应模型。为了检验养老观念机制如何影响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抑郁倾向的方向和强弱，本研究采用调节效应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Y = aX + bM + cXM + \varepsilon \tag{8}$$

其中， Y 为心理健康（抑郁倾向）， X 为自变量再就业， M 为调节变量养老观念。 a ， b

分别为再就业与养老观念的主效应， c 为养老观念对再就业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 ε 为残差项。

3.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心理健康：本研究的心理健康用抑郁量表来衡量。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 量表）的修订版来测量抑郁倾向^[30]。抑郁量表是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21]。本研究中的量表由 9 项组成，包括老年人情绪、饮食、睡眠等问题。该量表询问受访者上周经历的情绪体验。在这九个项目中，三个项目表现出积极的情绪体验（感到快乐、日子愉悦和生活有趣），六个项目表现出消极的情绪体验（感到孤独、悲伤、食欲不振、失眠、无用和无所事事）。编码分别为 0=没有，1=有时，2=经常。本研究将积极倾向的 3 个选项反向编码，取值范围为 0—18。量表数值越大表明抑郁倾向水平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该量表在本研究中信度系数为 0.73。

(2) 自变量。再就业：再就业是指年满 60 周岁并享受离退休待遇同时还继续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其中再就业为 1，非再就业为 0。

(3) 调节变量。养儿防老观念：问卷中“俗话说：‘养儿（子）防老。’您同意这个观点吗？”，其中“不同意”持否定态度编码为 0，同意和看情况而定编码为 1。

(4) 中介变量。①经济收入：个人总收入取对数。②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向下代际经济支持的计算方式为过去 12 个月老年人给子女的钱、食品或礼物的价值总数。③老化态度：在本研究中，老化态度量表由 7 项组成，其中 4 项消极态度（已经变老、变老等于失去、变老难以交友、变老受到排斥），3 项积极态度（变老应对生活能力强、变老更睿智、变老也愉悦），赋值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为 1—5 分，取值范围为 7—35 分，前 4 项消极态度采用反向编码的方法，分数越大，积极老化态度的程度就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的信度系数为 0.63。④社会价值：问卷中“我觉得，我还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赋值为 1—5 分。

(5)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1，女=0）、年龄、宗教信仰（是=1，否=0）、婚姻（在婚=1，不在婚=0）、户籍（农业户籍=1，非农业户籍=0）、退休前在单位中所处的位置（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1，普通职工、职员与其他=0）、健康状况（很不健康到很健康 1—5 分，分值越大健康状况越好）、受教育程度（不识字=0，私塾、扫盲班、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12，大专及以上=15）、同居者数量、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四、基准回归结果与讨论

1. 基准回归分析：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再就业能够显著降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水平，在加入家庭特征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这说明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首先，城镇老年人可以通过继续就业扩大社交范围，维持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老年人能够嵌入现有的社会系统中从而获得归属感。其次，从职业中可以继续

获得来自自身、家庭，甚至是社会的肯定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总之，退休是个体经历心理转变的重要时期。一旦脱离原有的工作环境，老年人的心理认知和个体行为都会随之发生改变。而老年人很大程度上的心理驱动力是来自社会交往、价值肯定等方面，职业是实现上述途径的重要渠道^{〔31〕}。因而，退休后城镇老年人选择继续就业能够维持以往工作中的生活状态，保持角色的可持续性，降低了老年人的抑郁倾向，进而改善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在个人特征方面，在婚的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相比不在婚的能够显著降低其抑郁倾向，这可能是由于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以及家庭关系逐渐核心化的趋势进一步拉大了与亲子轴的空间距离，亲子关系对老年人情感支持功能被削弱，由此夫妻轴成为了老年人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此外，与退休前职位为普通职员相比，退休

前职位为管理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更高。一方面，较高的职位意味着较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另一方面，高职位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挑战，老年人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较高水平的健康状况能够减少城镇离退休老年人抑郁倾向，促进其心理健康。从身心一体化视角来看，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生理状态才能寓于健康的灵魂。有趣的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N	平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抑郁倾向	3639	3.686	3.162
	再就业	4206	0.058	0.234
控制变量	年龄	4209	70.569	8.139
	性别	4176	0.540	0.498
	宗教信仰	4203	0.100	0.300
	婚姻	4204	0.725	0.447
	户籍	4205	0.031	0.173
	退休前职业地位	4159	0.331	0.471
	健康状况	4124	3.407	1.013
	受教育程度	4206	9.134	3.979
	同居者数量	4184	2.913	2.624
	儿子数量	4128	1.191	0.928
中介变量	女儿数量	4063	1.185	1.054
	年收入水平	4037	10.275	0.634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3987	3.770	4.906
	老化态度	3469	20.719	5.336
调节变量	社会价值	3738	3.234	1.236
	养儿防老观念	3763	0.706	0.456

表 2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抑郁倾向	模型 2 抑郁倾向
再就业（否）	-0.616**（0.217）	-0.665**（0.224）
个人特征		
性别（女）	0.126（0.106）	0.058（0.109）
年龄	0.005（0.007）	-0.003（0.008）
受教育程度	-0.024*（0.015）	-0.018（0.015）
宗教信仰（否）	0.204（0.167）	0.169（0.172）
婚姻状况（不在婚）	-1.029***（0.126）	-1.011***（0.130）
户籍（非农户籍）	0.009（0.303）	-0.118（0.319）
退休前职位（普通职员）	-0.548***（0.115）	-0.496***（0.117）
健康状况	-1.012***（0.051）	-1.005***（0.052）
家庭特征		
同居者数量		-0.019（0.018）
儿子个数		0.203**（0.064）
女儿个数		0.023（0.057）
常数项	8.000***（0.594）	8.266***（0.636）
R-squared	0.144	0.146
N	3548	3357

注：*** $p<0.001$ ，** $p<0.05$ ，* $p<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参照组。

是，在家庭特征中，我们发现儿子的数量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女儿的数量对其抑郁倾向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成家立业”有着天然的使命和责任感，然而随着当今婚姻市场中彩礼以及房价的升高，尤其对城镇多子家庭的父母而言将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同时，考虑到儿子在获得亲代经济支持和财产中的重要作用，相比于女儿，在赡养亲代中会表现出更多的功利性^[32]。

2. 模型内生性与倾向值匹配

上述模型中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再就业这一行为存在着非随机选择性，可能会导致选择性偏误。具体而言，心理健康状况更好的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可能本身就更易于参与劳动因而采取再就业行为，反之亦然。因此，模型可能在再就业和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上存在着交互作用。为了尽可能缓解由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对模型作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倾向值匹配需要检验再就业与非再就业在控制变量上的平衡性，由表3可知，在匹配前，再就业组和非再就业组在大多数控制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而经匹配后两组的标准差偏差均小于7%，并且匹配后的P值均大于0.1，因而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控制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样本通过均衡性检验。

表3 样本均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状况	实验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	偏差缩减 (%)	T 值	P 值
性别	匹配前	0.70	0.54	33.3		4.25	0.000
	匹配后	0.70	0.70	0.8	97.5	0.08	0.932
年龄	匹配前	66.04	70.38	-62.3		-7.46	0.000
	匹配后	66.04	66.02	0.3	99.5	0.03	0.973
受教育程度	匹配前	10.20	9.39	22.5		2.84	0.004
	匹配后	10.20	10.27	-1.9	91.7	-0.19	0.851
宗教信仰	匹配前	0.08	0.10	-8.7		-1.09	0.277
	匹配后	0.08	0.06	4.0	54.2	0.42	0.672
婚姻状况	匹配前	0.89	0.74	38.7		4.52	0.000
	匹配后	0.89	0.89	-1.4	96.4	-0.17	0.869
户籍	匹配前	0.04	0.03	9.7		1.46	0.145
	匹配后	0.04	0.03	6.8	29.8	0.63	0.528
退休前职位	匹配前	0.39	0.34	9.3		1.25	0.212
	匹配后	0.39	0.40	-2.8	69.5	-0.27	0.788
健康状况	匹配前	3.77	3.44	34.8		4.46	0.000
	匹配后	3.77	3.76	1.3	96.3	0.13	0.899
同居者数量	匹配前	2.86	2.94	-3.2		-0.34	0.733
	匹配后	2.86	2.79	3.4	-6.8	0.51	0.607
儿子个数	匹配前	0.98	1.17	-21.5		-2.66	0.008
	匹配后	0.98	0.98	0.4	98.3	0.04	0.970
女儿个数	匹配前	0.92	1.16	-24.6		-3.00	0.003
	匹配后	0.92	0.99	-6.6	73.1	-0.67	0.505

注：上述结果采用近邻匹配（k=4）的匹配结果，其他匹配结果也基本通过平衡性检验。

本研究选用近邻匹配、半径（卡尺）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匹配四种方式对样本进行匹配。由表 4 可知，ATT（处理组平均效应）分别在 5% 和 0.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ATT 的取值范围在 -0.857 到 -0.612 之间。再就业能够降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即再就业能够促进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通过多种方法进行匹配后，结论依然成立。

表 4 倾向得分匹配的 ATT 处理效应

匹配方法	ATT	标准误	Z 值
近邻匹配	-0.612	0.294	-2.08 **
半径（卡尺）匹配	-0.738	0.203	-3.63 ***
核匹配	-0.857	0.204	-4.20 ***
局部线性匹配	-0.807	0.207	-3.91 ***

注：*** $p<0.001$ ，** $p<0.05$ ，* $p<0.1$ ；近邻匹配 $k=4$ ，半径（卡尺）匹配的卡尺设为 0.01，局部线性匹配使用默认的核函数与宽带；标准误为由 bootstrap 自抽样 500 次得到。

五、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机理

1.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中介机制分析

表 5 中再就业对中介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在经济因素中，对于自身而言再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对于子代而言，再就业能够显著提升向下代际经济支持。这一方面是由于退休往往伴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绝大多数人员在退休后的收入较退休前会有所下降。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基本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在 60% 左右，然而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社会保险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不断下降^[33]。因此，再就业成为退休老年人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亲代对子代的经济依赖逐渐减弱，甚至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依然会为子代提供经济上的支持^[34]。综上，再就业不仅提高了城镇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也使得该群体成为家庭经济资源的提供者。

在精神因素中，再就业对积极的老化态度和社会价值均有促进作用，即再就业可以显著提升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积极的老化态度水平和社会价值。无论是积极的老化态度还是社会价值都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肯定。在角色理论中，工作被认为是保持原有社会角色的重要方式。老年人通过继续工作可以从中获得对自身乃至社会的肯定。具体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强调对老年人的尊重与珍视。然而在现代化变迁的过程中，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以及对生产力和竞争性的日益强调均对我国传统文化中老年人口的贡献和社会地位构成了威胁。在此情境下，影响了老年群体对自身价值和老化态度的判断，一些老年人开始否定自我价值，甚至认为自己是社会的负担^[35]。而再就业作为一种生产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稀释老年人在现代竞争中的焦虑，以保持老年人原有社会地位的权威性。

表 5 再就业对中介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3 收入水平	模型 4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模型 5 积极的老化态度	模型 6 社会价值
再就业（否）	0.192 *** (0.045)	0.847 ** (0.376)	0.822 ** (0.406)	0.526 *** (0.09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squared	0.153	0.060	0.096	0.091
N	3242	3212	3075	3272

注：*** $p<0.001$ ，** $p<0.05$ ，* $p<0.1$ ；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参照组。

为了进一步揭示收入水平、向下代际经济支持、积极的老化态度、社会价值的中介机制，本研究运用 KHB 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表 6 所示，模型 7—10 表示再就业分别通过影响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向下代际经济支持、积极的老化态度以及社会价值进而促进其心理健康，降低抑郁倾向。KHB 中介检验显示，就单独每个中介变量而言，收入水平可以解释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 8.74%，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可以解释 5.68%、积极的老化态度可以解释 24.52%、社会价值可以解释 44.72%。

表 6 中介效应的 KHB 检验

模型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总效应	-0.618 ** (0.230)	-0.663 ** (0.229)	-0.592 ** (0.224)	-0.627 ** (0.220)
直接效应	-0.564 ** (0.230)	-0.625 ** (0.229)	-0.447 ** (0.224)	-0.347 (0.221)
间接效应	-0.054 ** (0.021)	-0.038 ** (0.019)	-0.145 ** (0.072)	-0.280 *** (0.053)
中介效应 (%)	8.74	5.68	24.52	44.72
R-squared	0.15	0.15	0.22	0.18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3242	3212	3075	3272

注：*** $p<0.001$ ，** $p<0.05$ ，* $p<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上述是单独纳入每个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考虑到中介变量之间可能彼此相关，因此，需要将所有中介变量均纳入模型，以方便比较经济机制和精神机制中介比例的大小。由表 7 可知，四个中介变量同

表 7 经济机制和精神机制的中介比例比较

中介变量	间接效应	中介效应 (%)	累计中介效应 (%)
经济机制			
收入水平	-0.033	6.49	6.49
向下代际经济支持	-0.019	3.79	10.28
精神机制			
积极的老化态度	-0.121	23.65	33.93
社会价值	-0.166	32.41	66.34

时纳入时，总共可以解释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 66.34%。由于共同纳入中介变量后，受变量间相互干扰的影响，变量的中介比例会发生略微的差异。但是各变量的中介比例排序大小与单独引入时完全一致。具体而言，收入水平、向下代际经济支持、积极的老化态度、社会价值的中介比例分别为 6.49%、3.79%、23.65%、32.41%。由此可见，尽管再就业均能通过经济机制和精神机制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但精神机制（56.06%）的作用远远大于经济机制（10.28%）。其中社会价值的中介比例最高而向下代际经济支持比例最低。

从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中介比例来看，满足心理需求的动机要大于经济收入动机。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大动机就是提高收入水平。然而这一点对城镇退休老年人群体并不适用。有两种渠道可以解释上述原因：首先，从心理调适角度来讲，退休人员往往对退休后财务状况的下降有所预期，因此在退休过渡阶段，退休人员能够调试好心态以面对收入已经下降的事实^[6]。其次，与农村老年人不得不继续参与

劳动的行为不同,对于城镇老年人来说,一方面,城镇养老金的覆盖范围较高,并且还有持续增高的趋势;另一方面,我国老年人群退休年龄较低,因而退休后仍然保持着一定生产力。随着市场用工的逐渐灵活化,市场给予了老年人就业的机会。所以,对于有一定财富积累的城镇老年人,退休后收入水平的下降并不会对其生活质量产生较大的影响。而更多就业机会的出现,反而带给老年人更多的精神价值^[36]。总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相比以前老年人再就业的动机是经济驱动,现在更多的是追求精神价值,这一转变在城市中尤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向下代际经济支持能够作为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渠道,但在中介作用中所占比例最小。从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出发,家庭结构和代际转移可能是老年人再就业的主要动机,通过再就业给予子女更多的经济支持。相关研究表明,子女个数与老年人再就业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市经济压力的提高,老年人会选择继续就业以放松子代的预算约束,甚至出现了“啃老”现象,这反而剥夺了老年人的幸福感^[11,36]。从代际关系的视域来看,在代际关系日益失衡、重心不断倾向于子代的情景下,老年人往往将重点关注到子代,即自己过得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子代,会牺牲自身的利益为子代谋求幸福。然而本研究发现,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主体性体验。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现代性的持续浸入,传统的价值观念日渐松弛,个体思考问题的方式会趋于理性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转变不仅会影响到子代,也会影响到亲代。有研究表明,部分老年群体的代际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由情感逻辑向理性逻辑的转变^[37]。因而,退休的城镇老年人再就业时,不是一味地为子代付出,也会考虑自身的需求,而来自工作给予的积极的老化态度和社会价值感是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渠道。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研究中的另一个发现,那就是尽管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在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中介比例最低,但是中介关系依然显著存在。再就业可以通过提供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进而改善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这说明,尽管满足自身的精神追求(积极的老化态度与实现社会价值)是解释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心理健康影响的重要渠道,同时,在现代化变迁过程中,个体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代际关系,但是在父母对子代不计付出观念的主导下,通过再就业为子代提供经济支持仍然是影响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之,中介渠道的比例大小表明,退休后的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精神上的满足,但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

2.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调节机制分析

从家庭视阈出发,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从养老观念来考察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调节机制。由表8可知,养儿防老观念与再就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养儿防老观念能够削弱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抑郁程度的负向关系。具体表现为:当老年人倾向于养儿防老的观念时,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促进作用较小;而持否定养儿防老观念的群体,再就业对促进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较大。这项发现与原有的研究结果相似。相关研究表明,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城市中依然存在,拥有养

儿防老观念的老人因为寄希望于子代养老，因而再就业的概率会降低^[11]。特别是在中国，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父母再就业这一经济行为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紧密相关。因而，当老年群体认为养老是子代的责任时，继续就业不一定能够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综上，伴随着现代化和个体化的推进，我国的养老预期也会发生一定的转变。但是传统孝道文化与家庭养老观念依然会根植在社会中，并影响着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关系。

表 8 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调节机制分析

变量	模型 11 抑郁倾向
再就业（否）	-1.328 ** (0.435)
养儿防老观念（否）	-0.041 (0.118)
养儿防老观念×再就业	0.972 * (0.507)
R-squared	0.1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N	3302

注：*** $p<0.001$ ，** $p<0.05$ ，* $p<0.1$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参照组。

六、总结与讨论

在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的背景下，研究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对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三个方向：①再就业能够显著降低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抑郁倾向，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该结论在通过倾向值匹配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②中介作用机制表明，收入水平、向下代际经济支持、积极的老化态度、社会价值分别是影响再就业对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变量，中介比例总共为 66.34%，其中精神机制可以解释 56.06%（其中积极的老化态度可以解释 23.65%、社会价值可以解释 32.41%）远远大于经济机制的比例 10.28%（其中收入水平可以解释 6.49%、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可以解释 3.79%）。③调节机制表明，养儿防老观念会削弱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

该结论对促进城镇离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有以下启示。

第一，鉴于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延迟退休政策预期将促进城镇退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扶持力度，如开展技能培训和提供创业补贴优惠，同时制定相关政策保障老年人再就业中的相关权益。

第二，鉴于精神机制对改善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要远大于经济机制，因此要将关注重点放在城镇离退休老年群体的非物质层面。老化态度和社会价值是影响再就业对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渠道。一方面，老年人对老化态度的认知与社会态度有关。老年人在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年龄歧视，因此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年龄歧视等以创建良好的用工环境，减少老年人对老化态度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要积极宣传老年人工作职位对社会的重要贡献，他们与年轻人的工作同样重要。

第三，鉴于养儿防老观念在再就业对促进城镇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中的削弱作用，因此对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我们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孝道文化。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老年人再就业涉及到传统的孝道观念。在老年人的认知中养儿防老即家庭养老仍然是养老预期的主要形式，尤其对于那些倾向于传统养老观念的老年群体来说，继续就业可能不会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因而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过程中，要宣传积极的养老观念。同时由于现

代化的浸入，代际观念和主体性意识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为依靠自我养老提供了可能，养老预期也会发生转变，这些均为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奠定了价值基础。

参考文献：

- [1] 张川川. 延迟退休年龄：背景、争议与政策思考 [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42-51.
- [2] 郑爱文，黄志斌. 基于个人和社会双重视角的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J]. 宁夏社会科学，2018（5）：133-143.
- [3] VO K, FORDER P M, TAVENER M, et al. Retirement, age, gender and mental health: findings from the 45 and up study [J]. *Aging & Mental Health*, 2015, 19（7）：647-657.
- [4] 宋宝安，于天琪.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吉林省老年人口的调查研究 [J]. 人口学刊，2011（1）：42-46.
- [5] ZHAN Y, WANG M, LIU S, et al. Bridge employment and retirees' health: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9, 14（4）：374-389.
- [6] WANG M. Profiling retirees in the retirement transition and adjustment process: examining the longitudinal change patterns of retire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92（2）：455-474.
- [7] BUTTERWORTH P, GILL S C, RODGERS B, et al. Retirement and mental health: analysis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6, 62（5）：1179-1191.
- [8] ZENGER M, BRAHLER E, BERTH H, et al. Unemployment during working life and mental health of retirees: results of a representative survey [J]. *Aging & Mental Health*, 2011, 15（2）：178-185.
- [9] CHRIST S L, LEE D J, FLEMING L E, et al.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effect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older Americans: does working past age 65 protect against depression? [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7, 62（6）：399-403.
- [10] ANDIARA S, NITI M M, TANG C, et al. Continued work employment and volunteerism and mental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Singapore longitudinal ageing studies [J]. *Age & Ageing*, 2009, 38（5）：531-537.
- [11] 于丽，马丽媛，尹训东，等. 养老还是“啃老”？——基于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再就业研究 [J]. 劳动经济研究，2016（5）：24-54.
- [12] 张奇林，周艺梦. 中国城镇低龄退休老年人工作与幸福感的关系 [J]. 心理学报，2017（4）：472-481.
- [13] 黄文杰，吕康银. “退而不休”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税务与经济，2020（3）：22-31.
- [14] MEIN G, MARTIKAINEN P, HEMINGWAY H, et al. Is retirement good or bad fo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functioning? Whitehall II longitudinal study of civil servants [J].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 Community Health*, 2003, 57（1）：46-49.
- [15] CALVO E, SARKISIAN N, TAMBORINI C R. Causal effects of retirement timing on subjectiv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 68（1）：73-84.
- [16] 李月，陆杰华，成前，等. 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与抑郁的关系探究 [J]. 人口与发展，2020（3）：86-97.
- [17] 唐丹. 城乡因素在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模型中的调节效应 [J]. 人口研究，2010（3）：53-63.
- [18] BECKER G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299）：493-517.
- [19] CHEN F, LIU G, MAIR C A.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J]. *Social Forces*, 2011, 90（2）：571-594.
- [20] 杨善华. “责任伦理”主导下的积极养老与老龄化的社会治理 [J]. 新视野，2019（4）：73-77.
- [21] 孙鹃娟，冀云. 家庭“向下”代际支持行为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兼论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 [J]. 人口研究，2017（6）：98-109.

- [22] DIEHL M, WAHL H W, BARRETT A E, et al. Awareness of aging: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an emerging concept [J]. *Developmental Review*, 2014, 34 (2): 93-113.
- [23] HAVIGHURST R J. Successful aging [J]. *The Gerontologist*, 1961, 1 (1): 8-13.
- [24] WARR P. Work, un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5-59.
- [25] LEVY B. Stereotype embodiment: a psychosocial approach to aging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18 (6): 332-336.
- [26]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 [M].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171.
- [27] 周丽清, 陈烨, 冀嘉嘉, 等. 老年人老化态度、孝顺期待和传承感之间的关系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4 (3): 240-244.
- [28] CHEN L, GUO W, PEREZ C. The effect of aging attitude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older adults in China [J]. *Research on Aging*, 2021, 43 (2): 96-106.
- [29] KOHLER U, KARLSON K B, HOLM A. Comparing coefficients of nested nonlinear probability models [J]. *Stata Journal*, 2011, 11 (3): 420-438.
- [30] RADLOFF L S.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J].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77, 1 (3): 385-401.
- [31] 马健囡, 王德文. 老年前期人群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态度与行为意向分析 [J]. *人口与社会*, 2015 (4): 30-41.
- [32] 马春华. 中国城市家庭亲子关系结构及社会阶层的影响 [J]. *社会发展研究*, 2016 (3): 44-70, 243.
- [33] 周心怡, 邓龙真, 龚锋. 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缴费率与基本养老金目标替代率 [J]. *财贸研究*, 2020 (2): 57-67.
- [34] 郑丹丹, 易杨忱子. 养儿还能防老吗——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代际支持研究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 125-130.
- [35] LAI D W. Older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 ag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to mental health: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Social Work in Health Care*, 2009, 48 (3): 243-259.
- [36] 程杰. “退而不休”的劳动者: 转型中国的一个典型现象 [J]. *劳动经济研究*, 2014 (5): 68-103.
- [37] 刘成斌, 巩娜鑫. 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和代际观念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0 (1): 102-112, 128.

Effect of Reemployment on Mental Health of Urban Retired Elderly

ZHANG Liyuan, LIU Chengbin

(School of Sociolog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outline of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Goal 2035 have proposed a gradual extension in the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which means that delayed retirement has entered the planned implementation stage in China.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impact of reemploymen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conclusions are controversial. The aims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reemploy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family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ith income level, downward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aging attitude, and social values as intermediary, and old-age concept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s.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propensity value matching, KHB mediation decomposition eff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empir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employ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depression tendency and promote health of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and the results are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shows tha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reemployment among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income level, downward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aging attitude, and social value can explain 6.49%, 3.79%, 23.65%, and 32.41% of the relationship, respectively. This result means that the spiritual needs of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for reemployment are far greater than their economic need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aising children and providing the elderly” will weake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reemploymen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urban retired elderly.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layed retirement policy. In view of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recommended to increase the support for the reemployment policy of the retired elderly, create a good employment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a positive concept of old-age.

Keywords: reemployment; urban retired elderly; mental health;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concept of old-age

[责任编辑 武 玉]